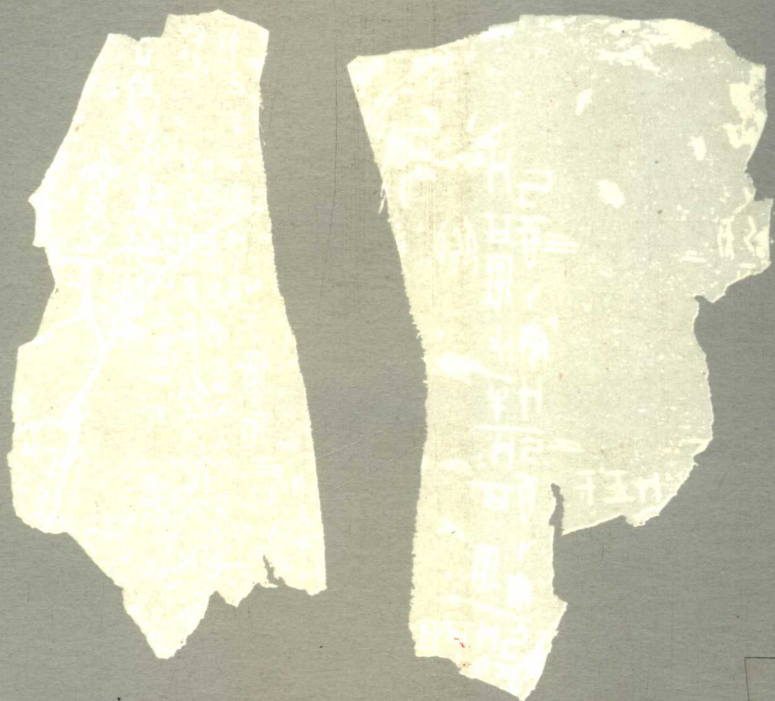


刊叢學獻文

探新學獻文國中

著 侯 湛 洪



行印局書生學灣臺



洪湛侯著

中國文獻學新探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中國文獻學新探／洪湛侯著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臺灣
學生，民81

面；公分，--(文獻學叢刊：3)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15-0394-0 (精裝).--ISBN 957-15-0395-9 (平裝)

1.圖書學-論文，講詞等

011.07

81002732

中國文獻學新探（全一冊）

著者：洪

湛

出版者：臺

灣學
生書

發行人：丁

文治

發行所：臺

灣學書局

本局登記：行政院新聞局出版臺業字第 一〇〇 號
 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八號
 電話：三三六四
 FAX：三三六四

印刷所：淵

明印刷廠

香港總經銷：

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
字樓及七字樓
電話：七九五九五

定價
精裝新臺幣二四〇元
平裝新臺幣一八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初版

01106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394-0 (精裝)
ISBN 957-15-0395-9 (平裝)

自序

是書既以《中國文獻學新探》命名，對於文獻、文獻學這些基本概念，不能無說，請試論之：從歷史發展看，我國的文獻產生很早，而文獻學一詞的出現却比較遲，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文獻研究，本來就處在萌芽階段，自漢代以迄清代，從事文獻整理和文獻研究的工作，或者被稱為校讎，或者被稱為考據學、國學、或整理國故等等，從來沒有得到過正名。『文獻學』的名稱，近代方始出現，它既不同於歷史上的經學、樸學，也不同於目錄學、考古學、語言文學。它的確切含義，還正在被人們逐步認識和論定之中。

『文獻』一詞，最早見於《論語·八佾》，鄭玄和朱熹解釋『文』為文章，『獻』為賢才或賢。元、明以後，已有人把『文獻』看作書籍資料的代稱。當代學者對文獻的看法也還不大一致，有的認為文獻包括書本的記載和著舊的言論，這還是傳統的看法，有的把文獻看作古籍的同義語，認為文獻就是古籍，這看法也未為盡當。雖然文獻的主要部份為古籍，但它還包括了古籍以外的甲骨文、金文、簡牘、碑拓、文書、檔案、信札、契約、手稿等各種形式的文字資料。把文獻局限於古籍，是縮小了文獻的含義。

文獻必須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，但決不是凡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東西都是文獻。例如地下出土的古物，遠古人類的骨骼，沒有文字的陶器、銅器、漆器，以及古代遺址、模型、造像、繪畫等等，這些實物，雖然有歷史價值，有的是歷史文物，但它們是古器物學、

古人類學的研究對象，屬於考古範疇，與文獻有別。把文獻釋作文物，則是擴大了文獻的範圍。

時至今日，由於文獻的內容、形式以及記錄文獻的載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，因此又有人主張把文獻區分為『現代文獻』和『古典文獻』。但不論如何，總應該有一個兩者可以相通的定義。現在是否可以這樣理解：凡是用文字寫成的，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圖書資料，就是『文獻』，對於這些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的一門學科，就是『文獻學』。

自從杭州大學創辦文獻專業以來，我即濫竽其間，開設了文獻學方面的幾門主要課程，結合教學，對文獻學領域中某些素有爭議的問題，撰文進行探索，抒發一得之愚。第以中國文獻歷史的源遠流長，文獻內容之博大精深，文獻範圍之寬廣多門，樗櫟之材，雖竭盡其力猶不足以窺其堂奧。即有所造述，亦不過作拋磚之試而已。一九八九年冬季，應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邀請，來美講學，並協助籌建東亞圖書館。工作餘暇，仍繼續研治中國文獻學。東方系美國漢學家何瞻教授前曾訪問過杭州大學，過從有素，今此邂逅，倍感親切，漢學家葛浩文教授，則此番來美後始相識。舊雨新交，常相研討，乃盡出篋中所携文獻論稿若干，向這些美國朋友求教。承何瞻教授好意，相約台灣大學王德毅教授，爲之推薦出版。德毅教授以史學名家，馳譽海內外，知名仰慕已久。以文會友，轉勝舊交。忝蒙不棄，予以鼎力成全。然自揣何能，敢以拙劣之稿，妄談結集，繼又思之，擬刊之文，都已先後在專刊雜誌上公開發表過，內容無所改動，今重新彙輯，祇不過勒爲一編，便於披覽而已。『它山

之石，可以攻玉』，今能藉此機會，擴大交流，獲得海內外文獻專家，廣大讀者，進而見教，糾其未允，匡其不逮，其獲益豈淺鮮也哉！爰述此事原委於簡端，雪留鴻爪，兼誌謝忱。是爲序。

一九九一年九月洪湛侯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



洪漢侯 安徽省歙縣人。民國十七年生，早歲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，從陳子展先生研究《詩經》；後調杭州大學，治《詩》之外，又致力於中國古典文獻研究；現為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。一九八九年應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邀請，來美國講學。著有《中國文獻學》、《詩經學史》等書，主編有《楚辭要籍解題》、《文史工具書辭典》等書。曾為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中國文學卷》撰寫《歷代詩經研究》等重要條目十餘題。發表論文數十篇，其中《古典文獻學的重要課題》、《論四庫全書館輯錄大典本的功過得失》、以及在台灣《漢學研究》發表的《百部叢書集成評》等文，在學術界影響較大。

內容簡介

本書收論文十篇，對文獻、文獻學的定義、記錄文獻的載體、文獻整理的各種方法、文獻學史上某些素有爭議的問題，以及有關發掘整理文獻理論的規劃等等，皆有論列；尤對《永樂大典》影印本和近年台灣出版的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亦有較為詳細的專題評述。所論皆有深度，時多創見。書中並對四庫全書館輯錄「大典本」功過得失的評價，對輯佚、辨偽歷史源流的考訂，對建立中國文獻學完整體系的大膽設想，對利用《永樂大典》影印本和逐步開展「大典學」研究的具體建議，論證精密，見解新穎，卓然成一家之說，文字亦優美流暢，繁簡得體，學術性可讀性都比較強。

中國文獻學新探 目錄

• 錄 目 •

自序		I
一 古典文獻學的重要課題		一
— 兼論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		
二 古代記錄文獻的材料		二三
三 辨僞簡論		五五
四 輯佚簡論		九三
五 類書溯源		一二九
六 類書的文獻價值		一三七
七 論四庫全書館輯錄「大典本」的功過得失		一五三
— 兼論建立「大典學」與整理《大典》影印本		
八 《永樂大典》嘉隆副本考略		一七九
九 古籍的考辨		一九九
十 《百部叢書集成》評		二〇九

一、古典文獻學的重要課題

——兼論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

我國的古典文獻有着極為悠久的歷史，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和整理，從而形成的一門學問，就是文獻學。在我國文獻產生很早而文獻學一詞的出現却比較遲，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文獻研究，本來就處在萌芽階段；漢代以來，從事研究和整理文獻的工作實踐，或者被稱作「校讎」，或者被稱作「國學研究」「整理國故」等等，從來沒有得到正名，文獻學的名詞近代才出現，它既不同於歷史上的「經學」「樸學」，也不同於「考古學」「語言文學」，它的確切涵義，還正在被人們逐步認識和論定之中。

「文獻」一詞，最早見於《論語·八佾》篇，鄭玄和朱熹解釋「文」為「文章」，「獻」為「賢才」或「賢」。元代馬端臨作《文獻通考》，取「文獻」二字作為書名，自序謂「引古經史謂之『文』」，參以唐末以來諸臣之奏議、諸儒之議論謂之『獻』」。馬端臨稍後，元代的大詩人楊維禎《送僧歸日本》詩：「我欲東夷訪文獻，歸來中土校全經」，所指的「文獻」似乎已專指書籍資料了。明代編纂《永樂大典》，開始曾稱作《文獻大成》；稍後，程敏政作《新安文獻志》；清代錢林輯《文獻徵存錄》，都把「文獻」作為書籍資料的代稱。

當代學者對「文獻」的看法也還不太一致，有的認為「文獻」包括書本的記載和着舊的

言論，這是傳統的看法；有的把「文獻」看作「古籍」的同義語，認為「文獻」就是「古籍」，這看法也未爲盡當，雖然「文獻」主要內容是「古籍」，但它還包含了「古籍」以外的甲骨文、金文、簡牘、碑拓、文書、檔案、信札、契約、手稿等各種形式的「文獻」，把「文獻」局限於「古籍」，是縮小了「文獻」的含義。

「文獻」必須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，但決不是凡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東西都是「文獻」。例如地下掘出的古物，遠古人類的骨骼，沒有文字的陶器、銅器、漆器，以及古代的遺址、模型、造像、繪畫等等，這些實物，雖然有歷史價值，有的是歷史文物，但它們是古器物學、古人類學的研究對象，屬於考古範疇，與「文獻」有別。《辭源》給「文獻」下的定義是：「指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。」《辭海》略同。按「文物」指的是歷代遺留下來的、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東西，諸如建築、雕刻、繪畫、圖書、陶器等，古籍中部分精刻本固然有文物價值，但一般古籍却稱不上文物，把「文獻」釋作「圖書文物」則是擴大了「文獻」的範圍。

隨着現代科學的發展，當代有些情報工作者認為「情報」就是「文獻」。但是，情報是動態性的、活的，有較強的針對性，它不局限於文字，也可以用符號記錄，還有實物情報，如採取實物呈列、語言交流等方式，它不局限於以往和現時的材料，還能預測將來，有反饋作用。這些特點，與用文字記載的靜止的圖書資料，迥然有別。情報就是文獻的說法，更是不能成立的。

時至今日，由於文獻的內容、形式以及記錄文獻的載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，因此又有人主張把「文獻」區分爲「現代文獻」與「古典文獻」，但不論如何，總應當有一個兩者可以相通的定義。我想是否可以這樣理解：凡是用文字寫成的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圖書資料，就是「文獻」。

文獻學的含義怎樣？迄今爲止，國內辭書還沒有設立「文獻學」這一詞目。台灣《中文大辭典》雖然立了詞目，釋文却很含糊：「研究一民族之語言文學，以了解其文明程度之學術，謂之文獻學」，它撇開歷史文獻不談，把「文獻學」局限在「研究一民族之語言文學」，其疏略失當，蓋已毋容置辯。文獻學本是關於文獻研究和整理的一門學問，文獻本身的特點、文獻整理的方法、文獻學的歷史、文獻學的理論都應包括在內，簡單地說，文獻學應包括文獻的體、法、史、論等幾方面的內容，並把這些熔爲一體，進行系統研究，逐步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。

當前幾部「文獻學」專書，都側重於講授文獻整理方法，業師欣夫先生《文獻學講義》●特設一章，名曰：「文獻學的三個內容」，並闡述說：「既稱爲『文獻學』就必須名副其實，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、運用、處理、接受文獻的方法……本課定爲三個內容：一、目錄、二、版本、三、校讎。」認爲「文獻學」只是講授文獻整理方法的，這種觀點，現在還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認爲「文獻學」無非是文字、音韻、訓詁加上版本、目錄、校勘而已。文字、音韻、訓詁屬「古代漢語」範圍，因而文獻學只須講講版本、目錄、校勘就可以了。這

種看法，恐怕是不夠全面的。

從現在高等院校開設的課程看，中國文學專業一般開設有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、馬列文論、文學概論、文藝批評與寫作等；歷史專業開設有中國歷史、史學史、史學概論、考古學通論等；檔案學專業開設有檔案管理學、檔案文獻編纂、中國檔案事業史、檔案學概論等^②。上述這些課程的設置，都考慮到各個專業的特點、研究方法、歷史和理論。就是中國醫院校開設課程也還注意到中醫傳統的「理、法、方、藥」完整體系。惟獨文獻專業的「中國文獻學」却只講文獻整理方法，只講整理方法中的部分內容，豈非以偏概全，名不副實！現在，全國各省先後設立了二十多所古籍研究所，在四所大學裡開設了文獻專業，面向全國招生，一些有條件的高等學校，先後開始招收古典文獻方面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，毫無疑問，「中國文獻學」業已成爲一門重要的學科，而不僅僅是一門課程。當前面對教學改革的的大好形勢，深盼能對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，作出一些相應的改革：建議按照「文獻學」的體、法、史、論四方面的內容，試設「書籍（檔案）制度史」「文獻整理方法論」「中國文獻學史」「中國文獻學理論」等專業基礎課；同時，結合文獻整理方法，開設目錄、版本、校勘、辨僞、輯佚、編纂等選修課；結合文獻學的相關學科，開設「古代漢語」^③「考古學」「圖書學」「中國古代文化史」等課程。如有條件，還可以開設「古籍整理」「文史工具書」「古代文化知識」「史料學通論」「古代典章制度」等專題課。此外，加強課外實習，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，則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，使學生將來走上工作崗位，能夠學以致用，

成爲文獻部門真正能挑重擔的新生力量，不致高分低能，紙上談兵。下面再就文獻學的體、法、史、論四個部分，談一些粗淺認識，作爲引玉之磚。

(一) 體

凡文獻形體之特點皆屬之。

1. 文獻的載體 就是記錄文獻的材料，如現代所用的紙、膠片、磁帶等都是，而在紙和雕版印刷發明之前，我國人民早就利用甲骨、金石、簡牘、繅帛來刻寫紀事，這些記錄文獻的載體，起着保存、傳播和發展文化的作用。甲骨、竹木簡和帛書都是近代、當代才陸續出土的，甲骨文在清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才被發現，至一九八四年統計，八十五年總共發現甲骨約十五萬片左右，其中包括流散海外十二個國家收藏的甲骨二六七〇〇片^①。對於甲骨文的研究，現在已經成爲一門專門學問，甲骨文可釋的字約一千個以上。關於青銅器上的文字，商代銘文比較簡單，西周銘文最繁，至春秋時又趨於簡要，已發現的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總數約有一萬件以上，其中帶有銘文的銅器約四、五千件，發現商周金文單字約共三五〇〇個，其中可釋字約二〇〇〇個。古代發現竹、木簡牘見於記載的已有過多次^②，原物早已蕩然無存。近世自清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新疆塔里木河出土晉代木簡，到一九四九年五十年間，發現竹木簡並見於報導的共有七次，一九一四年發現的敦煌漢簡、一九三〇

年發現的居延漢簡、羅布淖爾漢簡，影響都比較大。自一九四九年來，先後在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山東、江蘇、江西、甘肅、新疆等地發現竹木簡三十批，約共四萬枚，其中時代較早的是湖南長沙、河南信陽、湖北江陵出土的戰國楚簡，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書簡。雖然歷史記載春秋時期已用簡書，但迄今爲止，還沒有發現春秋時期的簡牘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帛書也已經相當流行，因此古代文獻常有「竹帛」並提的記載，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帛畫的同時，還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簡，這說明在紙張發明以前，多是簡帛同用。只是縑帛埋藏在地下容易腐朽，所以近現代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竹簡比較多，發現的帛書却比較少，因而我們對帛書的知識也比較缺乏，一九四二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（又稱《晚周繪書》）早已流散國外，一九七三年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二十多種十二萬多字的西漢帛書，才豐富了我們對縑帛的認識。

「著於竹帛謂之書」，簡冊和帛書，在漢代是書籍的主要形式，就是在紙張發明以後的一段時間裡，縑帛仍然在繼續使用，東漢以後，紙張才漸漸代替了縑帛，成爲常用的書寫材料。

我們從甲骨、金石、竹簡、縑帛、紙這些文獻載體發展變化的過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文字形體和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。商周銘文的字體，一般稱爲大篆，秦漢時期轉向小篆和隸書，戰國楚簡的文字，上承商周甲骨文、金文，下啓秦篆和隸書，是文字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，具有獨特風格。出土的漢簡，則多爲隸書，如武威漢代《儀禮》簡，共存二萬七

千四百餘字，較之熹平石經七經殘存八千數百字，多了將近二萬個字，而且都是真正漢代通行的隸書，可見這些記錄文獻的載體，也是研究我國文字源流演變的重要材料。這些簡牘，同時也是考核書籍制度的實物。竹簡編聯成冊，收卷起來，要用最後一枚簡作軸，從尾部往前反卷，第一枚簡的背面在外邊，加上篇題，便成爲一卷書的形式，等到發明了紙，轉移成爲卷軸的紙本，再發展爲宋代各種形式的裝本，或多或少還保存着古代簡冊形式遺留的痕跡，所以竹簡的編聯形式是研究我國古代簡牘制度和書史的重要依據。我國現存的古籍，就是從這些記錄文字的材料發展而來的。這些材料的本身還不是古書，甲骨是古人占卜後刻上去的卜辭，青銅器上的文字，多數是王公貴族紀功頌德的銘文，殷周時期竹木簡上的文字多數是紀事。這些，不論它的內容如何，當時都還沒有編成書，都只能算作文獻或檔案，直到經過孔子和戰國時學者的整理，編成經傳，才可以稱得上是「書」。現在有些論述古典文獻的著作，把所有古代記錄文獻的材料，渾稱之曰「書」，有的著作，甚至還說什麼「龜甲獸骨的書」「青銅的書」「竹木的書」「繅帛的書」「石頭的書」，並總稱之爲「雕版印刷發明前的古籍圖書」^⑤。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！

我們要研究古代文獻的載體，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意思，就是這些載體所錄的材料本身的價值，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《儀禮》簡，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的《孫子兵法》《孫臏兵法》等兵書簡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《老子》《帛書》，都是考古史上的驚人發現，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和科研價值，利用這些文字材料，補史、考史、校史、證史，其作用是難以估量的。

2. 文獻的體裁

古代流傳至今的文獻資料，從編纂形式區分，大致可以分為匯編、專著、總集、別集、辭書、類書、政書、叢書、長編、約編、方志、表譜、圖錄、碑帖、信札、檔案等十多種體裁，細分當不止此，這裡不過粗略地舉其常見常用者而已，文獻工作者應把這些看作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熟悉它，研究它。熟悉它的內容特點，便於閱讀使用，研究它的編纂結構，便於推陳出新。這些文獻體裁，就其中任何一門深入研究，都是專家之學。宋代鄭樵之重視圖譜，清代章學誠之論述方志，當代胡道靜對類書的研究，張滌華對類書和總集的評述，都已卓然名家。

在文獻研究工作上，有些封建時代的傳統看法，有時也給研究工作帶來一定的影響。例如總集的起源問題，歷來都認為先有別集，後有總集，別集之名起於東漢^①，總集起源於晉代摯虞的《文章流別》，其書已佚，現存總集，以《文選》為第一部。其實，總集之起，應該上溯《詩》《騷》，可是，自漢代以來，《詩》被列為「六藝」之一，成了儒家的經典；《楚辭》又被後代目錄家列為獨立的類目——「楚辭類」，都不算作總集。相沿至今，積重難返，現在應該循名責實，把這些因襲未當的分類，糾正過來，還其本來面目。聯想到余嘉錫先生疑西京之末，已有別集，並認為「秦漢諸子，即後世之文集」^②，這都是實事求是評論文獻體裁的卓越見解，對我們很有教益和啓迪。

3. 文獻的體例

文獻中的古書，特別是先秦時期的古書，其體例與後世不盡相同，試舉三例，述之於下：